

改革开放与新中国外交

刘建飞

(中共中央党校 国际战略研究所, 北京 海淀 100091)

[摘要] 同改革开放之前相比较,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外交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 改革开放重塑了当代中国外交, 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同西方国家乃至同整个世界的关系。中国认知国际环境和自己的国家利益出现根本改变, 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继续深入发展。对于改革开放与中国外交的关系, 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分析的主流理论能够给出一定的解释。

[关键词] 新中国外交; 改革开放; 中国与世界; 国际环境; 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15)01-0107-06

DOI:10.14119/j.cnki.zgxb.2015.01.019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带来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性巨变, 也必然深刻地影响以至重塑新中国外交。探讨改革开放与新中国外交的关系, 把握当前中国外交的基本特征和未来走势, 意义重大。

一、改革开放推动新中国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 同西方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对立状态。1970年代早期, 虽然中美关系的缓和带动新中国同一大批西方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但是,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 而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交往则相当有限。受到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的影响, 中国仍然将与之建交的西方国家看成是需要暂时联合的“敌人”, 以便共同应对更加危险的对手。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是拉住次要的敌人, 共同对付最主要的敌人。当时, 在国际舞台运用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 新中国与西方国

家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策略性, 其基础是“苏联威胁”。如果“苏联威胁”减弱或消失, 那么, 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动力也会相应地减弱或消失。

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是1978年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转移国家工作重心, 对内实行改革, 对外实行开放, 带领各族人民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 力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对外开放主要是面向西方国家。至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和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问题, 或者早已解决, 或者并不突出。因此, 对西方国家的开放, 直接影响着新中国的外交。

中国搞现代化建设, 需要学习已经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 向它们开放, 同它们保持良好关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强调: “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 故步自封, 夜郎自大, 是发达不起来的。”^[1]

如果说, 新中国成立之时, 我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先进国家是苏联, 那么, 到了1970年代, 邓小平已经

[收稿日期] 2014-07-30; **[修回日期]** 2014-09-17

[作者简介] 刘建飞(1959-), 男,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法学博士,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改变了看法。他心目中的经济先进、科技先进的国家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1-2]，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的水平”。他坦言：“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1-3]。中美建交不到一个月，邓小平访问美国，表达“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1-4]。

不可否认，当初，中国同西方国家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动力，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因为，毕竟当时的中国同苏联的国家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中国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需要借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这些大国的力量来抗衡苏联的军事威胁，维护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仍然坚持“一条线”战略的主因。而这时来自苏联的威胁与1970年前后相比，已经大大减弱。安全动力已经不是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最主要动力。最主要的动力是中国向西方国家开放，同西方国家建立良好关系，以便向它们学习先进的科技和管理，学习发展经济、搞现代化的经验。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也是维系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强有力的纽带。不管西方国家支持中国搞现代化是出于什么动机，在客观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西方国家发展对华关系的契机和动因，带来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和巨大共同利益。以中美两国为例，双方已经成为经济利益的攸关方，一损俱损。如果以主权国家为统计对象，中国与美国已经互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美国连续多年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3]。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使得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贝拉克·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将始于2006年并已举办6轮的两国定期“战略经济对话”改为“战略与经济对话”，至今已举办6轮，对话的领域十分广泛。2014年7月，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四个方面的共识：强化经济政策合作、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提升全球合作和国际规则、支持金融稳定和改革，并以此为基础做出29项机制性安排^[4]。战略对话取得的116项具体成果，涉及8个方面。其中的5个方面（地方合作、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环境保护合作、科技与农业合作、双边能源环境科技对话）73项具体成果密切相关经济发展^[5]。纵观国际关

系史，还没有哪两个大国之间形成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对话与合作的机制。

改革开放的推动中国与西方国家成为经济利益攸关方甚或利益共同体。两国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部分质变。当然，在意识形态上，双方还是对立的。西方国家试图“西化”、“分化”、“演变”中国的冷战思维仍然存在。但是，双方业已形成巨大的共同利益，再加上中国坚持不同西方国家搞意识形态对抗，所以，西方国家很难为了意识形态利益而牺牲长期的经济利益，逆转双方总体的和平共处关系。

二、改革开放促使新中国重新认知外部环境

改革开放决定中国外交的基本取向，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的外交面貌。同时，改革开放促使当代中国的国家决策者们重新审视、系统研判本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国家利益的着眼点，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当代中国外交。

改革开放之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主要搞革命和阶级斗争。冷战对抗的国际格局决定新中国巩固国家政权的任务异常艰巨。当时的中国决策者们很自然地运用“革命思维”和阶级斗争的眼光去观察外部环境和国际形势，寻找国际舞台上的“敌人”即革命的对象和“朋友”即革命的同盟军。或者实行“一边倒”战略，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作盟友，将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当作敌人。或者确立“一条线”战略，美欧日及其他反苏力量成为“朋友”。与之相配合的“三个世界”理论，明确划出“敌人”和“朋友”，“朋友”明显变多。

改革开放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将我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开始用“建设思维”、“发展思维”审视世界和研判外部环境、国际形势，团结一切可以借重的力量，在国际社会中尽可能多地争取朋友。对于中国来说，搞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既无后顾之忧地专心搞建设、谋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6-1]。二是实行对外开放，通过国际合作搞现代化建设。国际社会愿不愿意同中国合作，直接影响中国开放的进程。相比之下，前一个问题更为根本。如果认定中国面临着大规模战争的威胁，那么，中国也只能把维护国家安全作为当务

之急,经济建设不得不屈居次要位置,就是“打了仗再建设”。如果没有战争威胁,即使不搞对外开放,没有国际社会的合作,中国也可以安心搞建设。但是,效果肯定不佳,甚至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所以,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着力同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目的就是寻求这些国家能够同中国进行有效的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

在“发展思维”和“对外开放思维”的指导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观察外部环境和国际形势,终于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正确判断。后来,即使出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严峻局面和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的不利情况,中国的决策层也没有改变对时代主题与国际形势的基本认知。

经过短暂的、仍然带有旧时代结盟性质的“一条线”外交,中国外交很快转变为全方位外交。到1982年下半年,邓小平多次讲话提及反对霸权主义,已经不再单指苏联,而且包括美国。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提出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对外政策,强调中国“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特别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关系^①。从某种意义上说,全方位外交就是不树敌的外交。在国家关系方面,只要对方愿意,皆可成为我们的朋友。

三、改革开放重塑新中国利益观

国家利益通常分成安全层面的、经济层面的、政治层面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国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调整和排序这三个层面的国家利益,以此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于是,就产生了同一国家,甚至同一执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差异。这些不同层面的国家利益及其排序,构成一个国家的利益观,即不同层面的国家利益孰重孰轻,孰为核心利益,孰为次要利益或一般利益。

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基本不使用国家利益这个概念,而是代之以意识形态色彩的革命词汇。实际上,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外交决策,是将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或意识形态利益。在他们看来,走社会主义道路,

建立并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最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维护这样的国家政权,就成为新中国的最高利益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任务。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国际形势面前,他们判定不同的因素威胁新中国的安全。新中国成立以后,威胁来自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苏联。不同时期的威胁被分别表述为帝国主义、帝修反、社会帝国主义。任何国家的执政者都有维护本国的领土主权安全、政权安全的责任和任务。而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这个任务尤其艰巨。在那个时期,政治利益、意识形态利益、安全利益被安排到优先位置,经济利益的位置则相对靠后。

“发展思维”和“对外开放思维”引导当代中国的决策者们转变以往的国家利益观。他们直接使用“国家利益”的概念,有两点最为突出:

一是大大降低意识形态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利益居于高位,甚至与国家安全并重。虽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是安全的重要内容,并且在新中国初期也确实受到威胁。但是,那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利益不仅表现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甚至具有很强的进攻性,以至于国家外交工作以意识形态画线。出现这种状况与当时的冷战对抗格局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好形势有关。过于突出意识形态利益,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摒弃这种“革命思维”及其指导之下的政策。邓小平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的观点。”^②后来,我国外交不以意识形态画线,并不意味着抛弃意识形态。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利益主要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对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进攻,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基础上,我国处理存在分歧的国家关系,倡导超越意识形态歧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

二是大大提升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改革开放前,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时常交织在一起,重要性远远超过经济利益而被置于国家利益的核心位置。改革开放后,经济利益上升为首要利益。相应地,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则退居其次,尤其是以意

意识形态为灵魂的政治利益。当然,作为一个国家,安全肯定是基础。邓小平讲过,“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摆在第一位”^[8]。运用“建设思维”审视外部环境和国际形势,当代中国的决策者们认定,中国的基本安全是有保障的。于是,中国多次大幅度裁减军备,一度削减国防建设方面的投入。即便如此,也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再度将我国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暂时地超越经济利益。比如,我国应对1989年中期以来出自西方某些国家的制裁。

改革开放带来我国国家利益观的变化。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交格局稳步发展,同各类国家的关系很少大起大落。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外交格局则多次出现大变化,即突出意识形态利益和安全利益,致使敌友关系变化多端,昔日的朋友转眼之间就成为今天的敌人。安全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容易形成零和博弈。而在经济利益面前,中国与世界各国很容易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对话的共同语言,即更多的是经济关系当中的互利共赢与正和博弈。

四、改革开放重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总是同世界的某一部分处于对立状态,不能同外部世界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文化联系、社会联系,利益交汇点十分有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眼中,新中国是个“异类”,是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非正常国家”,有时还是“破旧立新”的“造反者”。拿破仑说过,“中国这头睡狮醒来会震惊世界!”问题是它将怎样震惊世界?使世界受益,还是使世界受害?如果是后者,还不如不让它醒来。

改革开放在改变中国自身的过程中也极大地改变着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加速中国融入世界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国与国际社会相互了解,认知不断加深,不仅重建同外部世界的利益关系,而且越来越同国际社会的理念合拍,同各国、各地区形成许多共同价值。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由国际体系的普通参与者逐步步入国际舞台的中央,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成为当代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融入世界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所必需的。清王朝试图拒绝融入,结果在西方列强的炮舰逼迫之下打开国门,屈辱地开始了融入的进程。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列强欺负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人民开始主宰自己的命

运。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被延缓,甚至一度逆转。实行改革开放,则大大加快了这个融入的进程。

中国融入世界,不仅体现在贸易、投资、人员等物质层面的交往,也体现在文化、信息、思想、观念层面的交流,更体现在制度层面。随着对外开放深入适应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法律体制、政治体制等逐渐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且成为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而作出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战略决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这是带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是中国融入当代世界的一个质的飞跃。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已经融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尽管这个秩序包含着不合理的成分。与此同时,在政治和安全方面,通过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东亚峰会、八国集团南北对话会、亚欧峰会等组织和机制,中国与西方各国乃至世界各国也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推动国际政治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不仅如此,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双边交往和多边交往增加着观察国际形势、处理国际事务的共同点,相应地促使中国调整国内的发展和改革。例如,中国政府有处理知识产权、气候变化、人权、非政府组织等问题和事务的相应机构。而针对中国国情,学习、借鉴别国的观念和制度中的合理成分,只能使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更加合拍。

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深相互了解的过程。从中国方面来说,在改革开放前,理论创新滞后,中国不能深入全面地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实况,简单地认为它是腐朽、没落、垂死的,应该被打倒和消灭。经过改革开放,我们认识到,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虽然还存在,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还有相当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义虽然比资本主义更加先进,并且最终要取代资本主义,但是,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在许多方面还需要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因此,就发展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存在共同利益,可以进行互利合作。从西方国家方面来说,经过同中国的交往,它们

也认识到,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已经存在很大区别。它不再谋求世界革命,而是愿意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这样的中国能够给予西方国家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9]。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推进,西方国家开始关注“中国发展模式”。一些有识之士出于自己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不完全认同这种模式,但却承认其发展经济的有效性,有意愿去研究它,至少不持完全排斥的态度。比如,在2012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针对美国保守派政客指责中国“人权问题”,要求中国走美国设定的“普世价值”道路。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陆克文就表示:他关注中国已有30多年时间。将现在的中国同过去的中国相对比,首先我们看到有4亿人口摆脱贫困,中国也不向其他国家输出苏联那套意识形态^[10]。陆克文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除了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走向的相互了解,在历史、文化、文明、民族精神、风俗习惯等方面,中国同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整个外部世界,同样加深着相互了解。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外交就是“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11]。“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12]。兼顾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当代中国正确制定的外交战略,是改革开放变革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必然结果。

五、改革开放重塑新中国外交的理论分析

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决策理论解读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外交的关系,可以深入理解当代中国长期实施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首先,现实主义外交理论。汉斯·摩根索认为,作为国家权力组成部分的外交有四项决策任务:根据已有的潜在实力确定国家的目标,评估别国的目标及其为实现这些目标所拥有的潜力和实力,确定双方的目标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相容,决定和实施适合于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13]。根据这一原理,当代

中国顺利推进改革开放的外交战略,重点就是改善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并且具有可行性。第一,中国领导人清楚,中国是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美苏冷战对抗的情况下,中国倒向哪一边,都会重大影响国际格局及其走势。就是说,中国具备进一步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潜在的實力”。第二,中国认识到,1972年以来的冷战时期,西方国家的安全战略主要是对抗苏联的攻势。为此,必须寻求同中国的合作,尤其需要开拓中国这个大市场。就是说,西方国家具备实现其发展对华关系的“潜力和实力”。第三,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安全战略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高度相容。第四,目标确定之后,实现目标的手段自然会有很多,如高层访问、经贸合作、军事合作。时至今日,现实主义外交理论仍然能够有力地解释中国与西方世界深入发展的国家关系,却不能够明确回答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其次,自由主义外交理论。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流派之一,自由主义强调国内政治的作用和观念影响力^[14],从而解决了现实主义理论无力解决的问题。邓小平时代及其后时代的中国外交,之所以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存在很大差异,就在于中国的内政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阶级斗争为纲转为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为内政服务。国家的外交战略必须适应国家大战略的变化而做出必要的调整。中国也不例外。就西方发达国家和整个世界而言,邓小平的看法不同于毛泽东的看法。其中,影响中国外交战略决策的较大看法是:西方发达国家领先的经济、科技值得中国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已经取代战争与革命而成为时代的主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了自己的国际观,也相应地改变着自己的国家利益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然要求外交更加重视经济利益,弱化意识形态利益。认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必然要进一步突出经济利益。

再次,建构主义外交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中国认知外部世界的环境是观念层面的建构,中国改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实践层面的建构。1972年以来,中国不断加深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交往。在这一过程中,中共领导人的决策观念发生显著变化,中国的内政、外交做出重

大调整。中国的和平发展促成外部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并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外部世界重新认知中国的政策变化,又促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当代世界。

有关外交政策的其他分析理论也都有其独特的视角、框架、方法,都能够从某一个侧面解释中国外交。一是比较外交政策理论,承认外交政策是由内外两个因素促成,同时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外交走向世界,中国外交的变化又为改革开放创造条件,使之顺利推进。如此循环往复。二是心理与社会环境理论,强调决策者个人的主观因素及其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是邓小平而不是别人开启和领导改革开放并开拓和领导中国外交新局面。其实,邓小平主政之前的新中国领导人也有机会这么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可以在本国如此开展。而只有邓小平实际开创了这一伟业。究其原因,与邓小平个人的特殊经历、远见卓识、才华能力和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文革”及其后两年的特殊社会环境有关。三是外交政策分析的文化视角,强调文化背景影响决策者的

思维方式,适用于解释中国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多方面内容。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和谐、仁政”的元素体现在新中国外交,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中国外交。中国重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但并未忽视同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国保持同美国的密切关系,也在努力推动同苏联实现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进入21世纪,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相比较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崇的“民主和平”,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针对同邻国存在的领土、领海纠纷,新中国主动提出“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主张。这在大国同小国的关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中国发挥其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又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息息有关。

总的来看,虽然国际关系的各种理论流派能够以其独到的分析特性解释改革开放与中国外交的关系,但同时也存在局限性。从根本上说,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解释改革开放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更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Z].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85^[1],10^[2],44^[3],109^[4].
- [2]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1/10/c\)\[2014-07-02118914142\].htm](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1/10/c)[2014-07-02118914142].htm)
- [3] 商务部新闻办公室. 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2014年1月16日)[EB/O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h/diaocd/201401/20140100462683.shtml>.
- [4] 外交部.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情况说明[EB/OL]. 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l_611380/dnzt_611382/dlldwl_668260/t11736667.shtml/.
- [5] 外交部.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EB/OL]. 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l_611380/dnzt_611382/dlldwl_668260/t11736631.shtml/.
- [6]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邓小平文选:第2卷[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1^[1],378^[2].
- [7] 胡耀邦.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
- [8]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邓小平文选:第3卷[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8.
- [9]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R]. Speech at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USA. 2005.
- [10] 人民网. <http://news.cn.yahoo.com/ypen/20120204/844989.html>.
- [11] 本书编辑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K].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5-46.
- [12] 本书编辑组.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K].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3.
- [13] 倪世雄,等.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71.
- [14] [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 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M]. 刘东国,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

(责任编辑 周晓中)